

傳播與中共所謂「國家統一」

朱邦彥

書名：*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作者：Alan P.D. Liu（劉平林）

出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71.

壹、前言

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共在其所謂「國家統一」的階段中，大眾傳播媒介究竟擔任甚麼樣的角色。而作者作這個研究，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研究是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研究中心做的，時間是從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研究的重點在於中共傳播媒介的基本結構及其運用。

第二階段的研究是在密西根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做的，時間是從一九六七年九月開始，研究的重點是把搜集到的資料加以分析解釋。

作者寫此書的最大目的，正是要把上述研究資料分析解釋的結果，披露出來。在分析解釋的過程中

，作者力求資料之時宜性，以免有落伍之譏。在報業結構方面，作者研究的依據主要是中共的印刷媒介，特別是其報章雜誌。而美國、香港以及台灣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作者也廣加搜集，不遺餘力。

貳、結構分析——大眾傳播與所謂「國家統一」

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重點是對閱聽人的行為加以量化和分析。這個原因，主要是由於美國的大眾媒介為私人經營，有其商業化的目的。然而在現代極權國家，如蘇聯、納粹德國和中共等，由於其大眾媒介乃是公然的政治宣傳工具，所以研究其媒介的重點應放在媒介本身和社會制度的交互影響上面。在這方面以 Alex Inkeles 對蘇聯媒介體系的研究，首開起先河。至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非新國家紛紛興起，這種對大眾媒介和社會制度交互影響的研究，乃不僅如雨後春筍，並且更加充實。

過去一些對中共媒介體系的研究，沒有好好衡量其政治與社會的關連，以致常忽略一個重要的關節，那就是：媒介促進中共所謂「國家統一」，具有甚麼樣的功能？我們之所以把焦點放在其所謂「國家統一」上頭，那是因為所謂「國家統一」的過程，亦即開發中國家藉以揚棄舊秩序而建立新準則的過程。

一、所謂「國家統一」

一般言之，中共所謂「國家統一」的內涵，實包含兩個階段，一為滲透（Penetration），一為認同（identification）。

在滲透階段中，乃從中央往下滲透到過去一直保持政治和文化自主的地區，其使用的手段，強硬勝

過一切。自始自終，文化滲透不絕如縷。諸如建設現代化交通事業，掃除文盲，推行共同語文，建立大眾傳播系統，普設新式機構，以吸引青年對所謂「新中國」作一番新的認識。此時大眾媒介擔任的角色，是把政令傳達給民眾，並加強民眾的政治意識。換言之，此時媒介反映政策者多，而反映社會者少。同時，上述各種力量，會幫助媒介逐漸傳播一套共同的模式、價值和符碼給群眾（特別是給青年）。如是則縱如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橫如公民與團體之間，彼此乃認同起來。而大眾文化的發展和共同語文的推行，亦會產生一種相互認同的力量，強硬的手段乃被取而代之。從此時起，媒介反映社會者多，而反映政策者少。認同有效地展開之後，政治首腦們為增強下層階級的統一，得以設法吸取回饋，作因革損益的參考。這可採取好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完全放鬆對媒介的政治控制；第二種是對媒介加以調整，尤其是內容方面的調整，以滿足日趨文明世故的群眾。

然而，不管中共或蘇聯，滲透與認同常成爲其政治領導人採取策略的困擾。以蘇聯言，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它就碰到兩者如何取其一一的問題。在此時期之前，對未統一地區加緊控制之迫切需要，必得排除二者取一的策略。俄共掌握政權初期，選擇不斷的進行政治滲透，作爲其統一的策略。然而經過一段發展期間，在其控制地區不再有政治危機時，蘇俄（或中共）的領導人乃必須實行長期的統一策略。這是一九三〇年代蘇俄煽動和宣傳政策改變的過渡時期。譬如，他們開始接納知識份子和管理人才，作爲蘇維埃制度中的合法份子以及宣傳工具的補充人員。譬如，他們又強調新聞事業爲專業工作，爲一種灌輸大眾思想的教育文化途徑，並且摒棄文藝的普羅政策。總之，蘇維埃側重認同，其程度不亞於滲透。而一九五二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其變化正與一九三〇年代早期的蘇聯相同。

然而，中共一發生這種變化，辯論迅即展開，他們商討策略的效果與得失。經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一整年的考慮，中共乃揚棄一九五二年以來的各種改變，重新把重點放在政治滲透、控制和編制上頭。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代表的是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來，其領導人之間對統一策略長期辯論的延長。此辯論的高潮中顯示，毛派的左翼領導份子反對以認同作為民族統一的基本途徑。文革期間中共所以要摧毀大眾傳播媒介，一方面是要防止某些社會團體（尤其是知識份子）利用媒介攻擊黨部，另一方面則要防止非左派的領導人助長這些團體做這種事。一言以蔽之，中共偽政權從未有過根源於認同的所謂「國家統一」。

然而，不管中共是選擇「滲透」抑或「認同」作為其所謂「國家統一」的基礎，大眾媒介本質上還是擔任傳聲筒的角色。

二、大眾媒介的組織

共產媒介國家的組織，與非共產開發中國家的媒介組織迥然不同。

實際上，非共產開發中國家大眾媒介的各種特色，都根源於一個通則：即偏促於一些較為西化的城市中。如是之故，這些國家的媒介亦偏向於對知識份子傳播。易言之，它們只訴求於受過現代教育的一小部份人。這些媒介不僅無法成為社會與文化中間那條鴻溝的橋梁，反而延長了這條鴻溝存在的時間。這些國家的政府當局，想以大眾媒介達成民族統一，使用的手法卻大都是否決與查禁，很少讓大眾媒介

積極去促進政治參與與經濟發展。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缺乏社會統一，現代化過程不平衡，並且缺乏良好的政治領袖。

我們看了非共產國家這種情況，再看看共產國家的大眾媒介組織，就可以發現後者的三個特點來了。第一個特點是結構的統一，第二個是發展的統一，第三個是與面對面的傳播聯合運用。

結構統一指的是中共政黨的區域行政結構和媒介的行政結構統一。

發展統一指的是中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經濟發展階段和大眾媒介內容的改變兩者並駕齊驅。這種技巧，使得中共把民意集中在每個階段所謂「國家重建」的重大使命上。

把大眾媒介與面對面的傳播相結合，乃是共產黨的一番重大革新。此種結合，使得中共能建立一個具有滲透性的政黨結構。由核心幹部充當媒介和口頭傳播的居間人，中共當局得以克服其社會統一的障礙，如地域觀念，共同語言的缺乏，和高度的文盲比例。媒介與口頭傳播於是乎乃變成暫時的社會統一代替品。

事實上，共產黨此種革新只不過是為媒介促進所謂「國家統一」這件事起個頭，其與別的开发中國家不能有效利用媒介達成相同目標這件事實，恰成對比。社會統一與大眾媒介在所謂「國家統一」過程中的關係，並沒因系統的革新而改變。

參、傳播過程——正式的宣传組織

各個傳播媒介，在專門技術上都屬獨立的機構；然而它在聯繫良好的宣傳機構中，卻是完整的部份

。在它由於文革而分裂之前，這種擬訂政策和協調各部的宣傳機構，乃各行政區域黨委會的宣傳部門。政黨宣傳網的總部，就是中央委員會的宣傳部門。在此部門引導下，有四個主要分支：地方黨委會宣傳部、文化部、大眾組織、和大眾媒介。此地專談宣傳部及大眾組織。

雖然文化大革命已動搖了正式的宣傳網，我們仍有許多理由來證明需要研究這些個組織。第一、若缺乏宣傳與煽動的組織，黨似乎不可能發展下去。最近，毛派和政黨統治階層已經要求重整黨的結構。如果此事發生，那麼宣傳機構也可確定是要重整了。將重點置於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型態，未來的宣傳工作將比過去更加強，上級來的宣傳控制力量亦將較過去為大。因此，回顧過去的結構，以便比較分析任何新的結構，實在有其必要。第二、宣傳組織、人事、和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首當其衝。對宣傳結構加以分析，可能顯示出目前中國大陸騷亂的一些個根本原因。

一、大眾說服的結構

就中共而言，黨宣傳部的結構與政黨和所謂「國家」的結構乃合而為一的。一般說來，教育系統由所謂「國家」管理，負責文化方面的事，意即教授普通學科，諸如地理、語言和科學等等。而政黨則負責宣傳（即政治思想和意識型態的灌輸）和教育上之決策。各種大眾傳播組織名義上是獨立的體系，而事實上，黨對它們擁有絕對的操縱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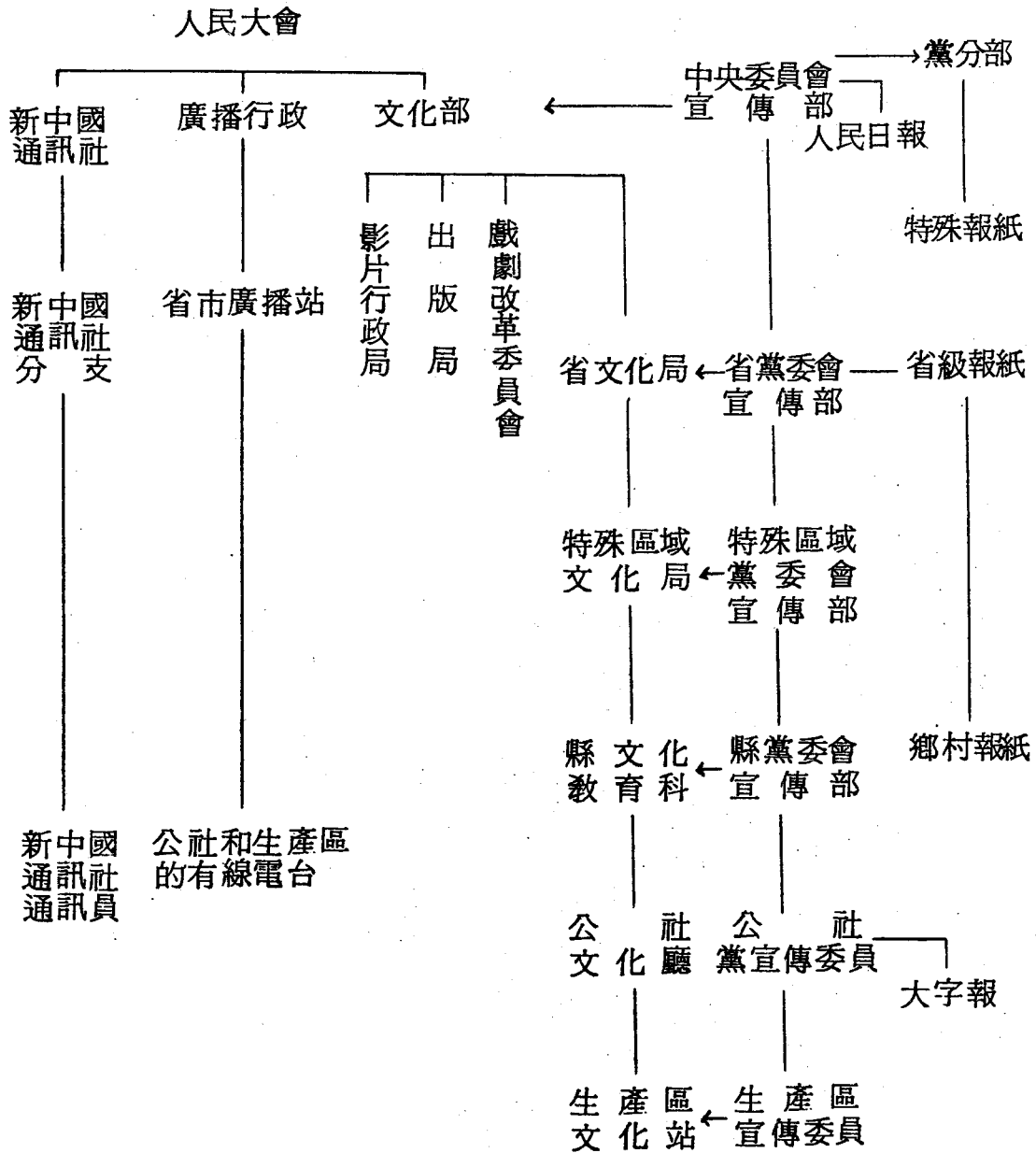
中共大眾媒介的行政體系，可劃分為三種。此精心設計之全盤結構類型，已如上述。下面一張圖表，將揭示一項中共異於其他共產國家的有趣事實，那就是：其所謂「國家」本身並無報業。在蘇聯，卻

有代表國家的報紙，如 *Izvestia* 這種流通全國性的報紙和一些地域性的報紙爲是。使中共在這方面與衆不同者有兩種看似合理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既然黨必須依賴相當數目之非共黨新聞從業者以經營報紙，政黨就想取得報業的完全控制權。第二個理由，由於大陸人民的識字率普遍偏低，黨報和大衆傳播組織的報紙與雜誌就能完全適合公衆的需要。下面這張圖表，說明的是中共政黨宣傳網的組織結構：

所謂「國家」系統

所謂「政黨」系統
大眾傳播機構

新聞學研究



若欲將所謂「國家」和政黨之間的功能分得更清楚，可以這樣說：所謂「國家」是做處理技術和安排人員的工作，而政黨卻做決策的工作。技術性較高的媒介，如廣播和影片，屬於所謂「國家」管轄；同樣的，書籍出版事業亦由所謂「國家」掌管，此出版事業大多數是教科書的印行。這種功能的劃分，似乎是受蘇聯的影響。Alex Inkeles說：「在蘇聯，每日事務的處理都由政府部門操縱，而黨則監督和指導政府部門。但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裡，黨都有某一個單位與政府執行部門平行。」

二、黨的宣傳部門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是宣傳和情報的司令中心。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宣傳部是由陸定一掌管，其下有十二個指導員代表，每一個代表負責一種特殊的範疇。舉例來說，陳伯達就曾是一「紅旗」的主編，並會監督科學研究的工作。周揚是文藝界首腦，胡喬木則負責所有的報紙。文化大革命以來，已攫奪了許多宣傳領導人的性命。這些被整肅者，包括陸定一和周揚等至少五個指導員。他們掌理的範圍有文學、藝術、新聞、教育、廣播和出版。除了陳伯達熱心贊助文革之外，其餘七個僅存的指導員代表因為猶未遭受公然的指責，命運未卜。

中委會的宣傳部和其他部門一樣，都是秘密進行工作的，對外透露的消息都非常簡略。據某一消息來源稱，宣傳部包括十五個組，每組的任務約略如左：

(一) 行政：掌理此部的一般行政。

(二) 宣傳：根據黨中委會的指示和計劃，作宣傳決策。

(三) 科學：監督科學研究發展，包括搜集別國科學發展的情報，科學工具和測量儀器的製造，以及對科學研究發展組織內政黨幹部的控制。

(四) 理論的教育：政黨幹部的教育和訓練，並出版與此目標有關的文件。

(五) 文學和藝術：出版古典和民間文學，改革傳統戲劇的意識型態，並監督「全國文藝協會」以及相關的學校與機構。

(六) 報紙和期刊：監督政黨的報紙和期刊。

(七) 新聞和出版：做出版的決策，並負責新聞紙和出版品的查禁。

(八) 教育：負責教育政策、教科書出版、和學校教師意識型態的改造。

(九) 公共健康和體育：擬定公共健康和體育方針，促進國家衛生和體育運動。

(十) 文化教育：監督特殊夜校和幹部短期課程，並提高幹部識字率。

(十一) 馬列主義研究：擬定馬列主義的一般宣傳方針，並與中委會之馬克斯、恩格爾、列寧、史達林等人作品出版翻譯局相互協調。

(十二) 編譯：研究國外作品，以作內部宣傳。

(十三) 政策研究：爲了宣傳部的內部利益，完成政黨政策和指示。

(十四) 國際聯絡：聯絡其他共產國家的宣傳機構。

(五)政治部門：監督宣傳部門內的政治工作。

上述宣傳部的內部結構，顯示出它涉及的範圍相當廣——甚至比蘇維埃的 Agit-Prop 還要廣。中共宣傳部的幾個組，亦涵蓋了蘇維埃 Agit-Prop 所未涉及到的活動。這可能顯示出，此兩個共產黨部必須對付的難題，有某些個差異存在。中共比蘇維埃更注意政黨幹部的訓練，它有理論教育和文化教育兩組專負責幹部訓練與教育的工作。馬列主義既為外來的學說，所以須經馬列研究和編譯兩組的詮釋，俾讓中國大陸人民融會貫通。

另一有趣的特色是「公共健康和體育」組。Inkeles 描述蘇維埃的 Agit-Prop 時，並未提到與此類似的部門；或許其文化啓蒙部門就涵括公共健康和體育，也未始不可能。無論如何，中共對這方面的注意，比蘇維埃強烈多了。

中共必須比蘇維埃更注意一些個難題，如幹部和人口識字率的普通低落，馬列主義外來意識型態的意義，以及人民現代化（工業化）態度的灌輸等。這並不是說，蘇維埃並沒遭到如文盲和培養人民現代化態度等難題。事實上是，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社會，特別是城市地區，其現代化程度就比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大陸高。從中共宣傳部所廣加注意的事項中，證明其領導人已想到這些問題。

毛澤東和他那些老練的幹部一採取這種蘇維埃宣傳組織的型態，乃進入一個新的工作領域。他們透過廣大的官僚政治網展開工作，以代替他們一向熟悉的強烈傳播工作型態。更進一步，毛澤東必須利用知識份子和具有知識背景的幹部，來經營此一複雜的組織。舉例言之，十二個指導員代表就以某種方式

參與過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或者共產統治時代以前在大學搞的共產活動。雖然毛澤東有權決定主要的宣傳政策，他還是必須依靠屬於知識份子的幹部和他們的部屬來執行其政策。很自然的，這就引起毛澤東對知識份子和官僚們已曲解或破壞其政策的恐懼心理。文革時期把宣傳部加以摧毀，說明了政黨宣傳網內的知識份子和官僚們已曲解和破壞了毛的許多決策。

宣傳部內部工作的情報，外面的人實際上一無所知。以一個重要的政黨組織而言，宣傳部以不求人或不公開而出名。重大決策總以中共黨中委會的名義發佈，宣傳部本身並無宣傳實質。從另一個角度看，宣傳部是藉其指導員和代表們的演說和聲明，去發揮令公眾注意的權力。

三、宣傳機構的官僚政治與決策

以對外而言，中共所有重大的宣傳政策都是以中央委員會名義發佈的。然而，幾年來中委會已逐漸擴大，而其有效的權力亦相同地減少。誠如Allen Whiting所言：「中委會太大，開會太少且太過簡略，不能成爲中共宣傳的真正決策中心。」黨內最可能決策的單位是中委會的政治局，有時候甚至不是所有政治局的成員都參與主要的決策。在此種情況下，決策者乃毛澤東自己和一些他最親信的黨領導人員。對人民產生嚴重後果的決策，如一九五八年之採行人民公社，就是以此種方式決定的。

由於宣傳節目是政黨政策的一個完整部份，有關於發展經濟和其他範圍的政策決定，也指令了一種同等的宣傳策略。若投毛澤東之所好而給他全民動員的機會，其以私人好惡來干預政黨宣傳工作的程度將

甚於其他類型的工作。事實上，似乎是毛澤東決定所有重大的宣傳活動。有時他必得壓倒其他人，以執行他的意思。如一九五七年發起「百花齊放，百鳥爭鳴」運動，即爲一例。

最近的證據顯示，從一九六三年開始，毛澤東親自決定所有與文革有關的重要宣傳活動。毛通常以兩種方式，將自己的決定告知其黨中委會的同事和部屬。第一種是藉在政治局或中委會的正式演說。譬如，恢復階級鬥爭的宣傳節目就是由毛所決定，再示知一九六二年第八屆黨中委會第十次全會的政黨首腦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亦由毛親自對一九六三年五月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宣布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最具戲劇性的顯例，說明毛如何將自己的決定，強制政黨內其他首腦去執行。決定展開「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第八屆黨中委會第十一次全會中宣布的。毛澤東怕自己的決定遭到反對，乃要求以其親信爲首之北京各大學內具有革命意識的師生及中委會文化革命隊隊員去參加開會。依照美國分析學者 Charles Neuhauser 所言：「某些重要省份的政黨首腦，顯然並沒參加全會。大廳裏充斥著熱心「革命」的毛派贊助者，投票可能並不按照規則。」由是觀之，中共權力結構的高階層決策是極度個人化的。

毛澤東將宣傳決定告知部屬——尤其是宣傳部政黨首腦們——的第二種方式，似乎是透過「批評」。文革期間，紅衛兵出版的東西不斷指控宣傳部的前政黨首腦們，謂其忽視毛對宣傳的「批評」並阻礙其實現。最有趣的問題是，這些「批評」當如何傳達？香港一熟練的政治分析家認爲，它們很可能是寫在宣傳部呈送給毛的工作報告上。這種判斷，是很合理的。依照中共新聞界的報告，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

年，毛曾藉「批評」對大眾傳播媒介和報業從業人員展開嚴厲的攻擊。但宣傳部的政黨首腦，對此反應並不熱衷。

雖然毛對宣傳的決策有支配權，但黨宣傳部的官僚仍是影響高階層決策的一大因素。這些官僚控制著低階層和高階層之間的傳播，毛的決定至少有一部份是基於由宣傳部通過的低階層報告。然而宣傳部為一執行機構，這可能比身為向上傳播的守門人更重要。它有權修正由上而下的傳播，並且控制大眾傳播組織的門路以及文化事業的官僚。

指導員代表有權召集作家、新聞從業者、演員、教師等的特別會議，以傳達中委會的重要指示或他們自己的任何決策。比方說，周揚被指控召集一九六四年元月的特別會議，因為此會表面上是為傳達毛最近對作家和新聞從業員的批判，事實上卻是修正毛的決策。教育事務指導員中一個代表叫 Lin Mu-han 的，被控告曾將毛對文化部的批評當做玩笑，並曾揚言沒必要將毛的批評向下傳達。

周揚和宣傳部的其他代表也有接近低層宣傳幹部的機會。因為毛縱然有決定權，他仍然需要這些指導員代表來促進宣傳機構的活動，好把宣傳伸展到整個大陸。

雖然宣傳部的內情很少為外界所知，它的力量卻能藉著其領導人在各種場合的出現而為大眾覺察到。這在大眾傳播組織的年會裡更形真確，如所謂「全國劇作家協會」或所謂「全國作家協會」就是如此。在這些集會裡，宣傳部經常派代表到場指導，這些代表都擅長對這些組織發表演說，而演說的內容實質上是針對這些組織的訓令。這些會議通常是由宣傳部發起舉辦的。

然而，宣傳機構透過官僚的執行而決策的力量實不值得誇耀。充其量，宣傳部及其分支僅能在邊上校正毛或政治局的規定而已。在一九六六年崩潰之前，宣傳部顯示的是一向強烈服從的傳統。然而，這種服從還是不能使毛滿意宣傳部的表現。毛要求中共宣傳者做的跟他們實際上做了的，兩者有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結果，引起了一九六六年對宣傳人員的大批整肅。

進而言之，做爲執行上級決策的官僚，其宣傳機構有時不免會受到中委會或政治局裡敵對者的阻礙。這似乎是極權社會宣傳家會遭到的尋常問題。誠如 Friedrich 和 Brzezinski 所指出者：

「獨裁政權到最後，並非杜絕許多 Intercine 鬥爭的發生，相反的，卻使此種鬥爭變得更兇猛更暴烈，那是自由世界所罕見的。此種特殊極權社會敵對因素的產生，爲全面的宣傳指示帶來了極大的難題。」

毛發起對中委會宣傳部的整肅，主要是由於此宣傳部順從了一批不同的領導人於一九五九和一九六五年間所制定的政策，這批領導人是以劉少奇帶頭的。毛自己說，一九五八年政治局領導人物的整肅是由他開始的。毛公然自所謂「中國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引退，但還保留共產黨主席的頭銜，劉少奇乃被選爲主席。這個改變是必要的，因爲毛所搞的「大躍進」已將經濟帶到崩潰邊緣，新領導人自會制定一套新經濟政策來渡過危機。劉的政策較重認同而非滲透，宣傳政策亦順應此種改變。但毛不滿意，認爲此種政策會走上資本主義之途。黨宣傳機構既然同意此種新政策，毛認爲這就是不忠於他的思想和領導。因此，毛之整肅宣傳機構，實非由於它和政黨立於反對地位，而是它順從政黨，問題在於政黨正

由別的派系領導，這不是很諷刺麼？

Alex Inkeles 指出：獨裁者的黨徒「會強迫自己對獨裁者的秘密指示時刻爲念，並且奉行不渝。」極權體制下整肅幹部的標準「並非基於他們之所爲，而是基於他們之所不爲：他們受審的原因，並非由於做錯甚麼事，而是由於沒有做事。沒有做事，就表示不願獻身致力，而且對秘密指示有所懷疑。」毛和左派份子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整肅中委會宣傳部，就因爲該部沒有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間執行毛要其抵制黨政的秘密指示！

肆、中共的報業

一、報業結構與政治統一

中共的報業結構，遠較電台結構爲複雜。從所有權的角度看，其報業結構可分爲左列五種類型：

(一)黨的機關報：它又分爲全國、省市和地方三個階層。全國性階層有「人民日報」，爲黨中委會的宣傳工具。省市階層如省市黨委會辦的報紙，目的是爲其直屬上級執行宣傳任務。地方階層指的是縣級以下，並沒有報紙。過去曾試辦地方報紙，均告失敗。各省省營報紙有農村版，聊備一格，算是爲縣民及「公社」人民的服務。

(二)群眾組織所辦的報紙：如由所謂「青年共產黨聯盟」所辦的「中國青年日報」，以及所謂「民族

聯盟」所辦的「光明日報」等是。這都是所謂「前進」的公家機構，專設來動員和控制各種社會團體的。

(三)機關報：如學校、學院、工廠和公社等公衆機關辦的報紙。這些報紙只供給自己內部，作爲第二類報紙的補充。

(四)沒有組織作基礎的報紙：這類報紙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存在，因其言論左傾，所以中共容許它們繼續發行。這類報紙被視爲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似乎只有三家發行：一爲「大公報」，二爲「文匯報」，三爲「上海晚報」。「大公報」銷行於西部幾個大城市，其他兩報則僅銷行於上海。

(五)軍中報紙：這類報紙的發行和編輯方針，是根據軍區的結構和軍中的內部組織而定。在任何一个軍區或軍中單位，其報紙都由政治部門掌管。就整個大陸言，軍中報紙是以「解放軍日報」爲代表，該報是國防部中央政治部的傳聲筒。

綜合以上五種報業結構，我們可以發現有兩種報業系統獨立而平行，且由最高階層一直滲透到最低階層，即一爲黨的報紙，一爲軍中報紙。黨報監督並控制群眾組織、公家機構和資產階級的報紙。以前說過，非軍中報紙大部集中在都市地區，只有黨報有農村版。在中共地區，報紙對農村滲透的力量沒有廣播網來得強烈。

各區黨委會的宣傳部門監督並控制其轄區內的軍中報紙。一九五八年以前，其控制型態主要是從外部控制；各地區黨委會擔任的角色，顧問的性質多，決策的性質少。然而一九五八年普遍轉變爲左翼意

識型態和政策這件事實，使其控制型態變為內部控制。由第一書記掌權的各區黨委會接收了各報的實際決策權，這是當時黨與公家機關全然改變關係的一部份。一般說來，中共對報業控制的興趣，遠較對電台控制的興趣為大。

「大躍進」的失敗，影響到報業結構以及政治體系的其他方面。不管從報紙的種類或銷數來看，一九五九年都比一九五八年減少。像一九五八年農村報紙如雨後春筍那種景象，突然消失了。根據找得到的資料和中共報紙的報導，到一九六三年不再有縣級和公社的報紙。起而代之的是特別刊有農村版的省級報紙，傳送給各該省的縣和公社人民閱讀。

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市級以上的報業結構已穩定。然而，中共政權卻始終未能辦好具有生存能力的縣級報紙。在文革期間，幾乎所有市級以上的報紙都遭到改組或吊銷的命運。中共七大報紙，當時只有三家繼續發行，那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和「光明日報」。經過幾次整肅，「青年共產黨聯盟」和「中國工人聯盟」瓦解之後，「中國青年日報」和「工人日報」乃被封閉。各省會和其他城市報紙的實況，不得而知。報紙被改組或吊銷的原因，似乎找不出一定的標準。

儘管歷經文化大革命，中共把報業與政黨結構加以統一的原則，在未來似乎仍然不會放棄。實際上，從文革重視思想和政治這件事實來判斷，報業與政治結構彼此統一的趨勢，在毛派完成政黨重建工作之後，只會繼續增長。

二、報業內容與政治統一

中共報紙的內容，其反映政黨統一策略的變遷者遠較廣播爲多。毛澤東於一九四八年告訴報紙從業員說：「你們的工作是要教育群眾，使群眾明瞭他們的興趣和職責所在，也明瞭黨的一般及特殊政策。」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共黨致力於權威之建立，當時他們強調報業要發揮兩種功能：一爲相互和自我批評，一爲組織。舉例言之，一九五〇年黨中委會在各報發起一個相互和自我批評的運動，其用意乃是要藉媒介把黨的「好印象」建立在人民心目中。「人民日報」的社論嘗言：「一個報紙必須面對廣大群眾和現實。它必須與各類型的讀者有密切連繫，聽取他們的意見，加強農工特派記者的組織和教育。」只要黨遵循左翼政策，農工特派記者就始終有其重要性。而中共建立政權的起初三年，爲左翼組織的所謂「全盛時期」。

一九五三年統一策略改變，五年計劃開始，報紙內容乃出現新的重點。因爲此時黨要求報紙發揮兩種功能：一爲工業宣傳，一爲群眾意識型態的形成。就對外言，黨指示報業學習去扮演當年蘇聯各報在其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所擔當的角色。就內部言，黨指示各報要效法東北（即中國重工業中心）的報紙。黨又訓令各報要把共產思想灌輸給群眾，群眾必須知道共產世界的情況。

工業宣傳和群眾意識型態的形成，要在現實中相互結合。黨要求報業的生產報告必須根據如下指示：「報紙的經濟宣傳，不應僅僅報導強有力的事實就算了事，透過這些事實的報導，報紙還須闡揚一種政策。這是我們黨報在觀念上的特色。我們絕不毫無批評並且完全客觀地報導事實，我們是根據政策需要選擇事實來報導，如此則這些事實報導乃變成我們政策的有利宣傳。」

然後，在一九五六年末期和一九五七年前半期這段政治控制的鬆懈期間，黨對報業的指示又改變了。這種改變又如以往一樣，在「人民日報」上顯示了出來。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該報版面居然從六版擴充到八版。報上刊載特別聲明來說明擴版的理由，並作自我批評。「人民日報」批評自己過去沒作廣泛的新聞報導，沒促進大眾對政府政策的討論，並且說過去儘刊些冗長古板使讀者覺得沒趣的文章。最有趣的是，「人民日報」開始宣稱報紙乃大眾意見的「喉舌」。它並提出一項聲明，謂黨或非黨的報紙應負起責任，使社會的意見導入正軌。並說甚麼從此之後，該報不僅要刊出主筆的意見，而且也要刊出與其不同的意見。當然，這種改變乃政治路線的改變使然。我們要記住一個事實，即中共的報業內容與政治是統一的。

三、報紙與所謂「國家統一」的關係

中共報紙多集中在城市地帶，為中上階層必要的媒介，讀者很多是在共產體系中較有機動性的人，這是其報紙的統一效力大大增強的原因。

由於黨的路線一直在改變，又由於報紙是具有權威性的公共記錄，讀報乃成爲那些想在黨裡表現的人（如學生和專業人員）一把寶貴的進身鑰匙，這是報紙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中共的報紙又喜歡鼓勵人民對黨內和整個大陸的「官僚主義」加以批評，更微妙的是能把群眾的侵犯意圖從朝向高階層領導份子轉而朝向少數人身上，這是報紙所謂「政治參與」的功能。

中共報紙又是測試其待決政策的共鳴盤。舉例言之，中共宣布節育爲大眾政策之前，報上先刊出有關節育的文章，如此可試探某些團體的意見，同時使人民對新政策有心理上的準備。另一項語文改革運動，中共運用報紙的手法，也跟節育政策的推行一模一樣。

Franz Schurmann 曾以如下六個範疇來分析中共報紙的內容：一爲黨的決策，二爲履行政策的堅實經驗，三爲一般原則，四爲批評原則，五爲宣傳，六爲公衆消息。由這些個範疇，中共報紙與其所謂「國家統一」的關係，可知一斑。

目前在黨內握有控制權的左翼份子，企圖把報業轉變爲煽動大眾的媒介，使報紙產生了下列的新趨勢：

- (一) 報紙內容力求簡單化、直接化和規格化。
- (二) 使報業孤立，好讓報紙更具有滲透的力量。
- (三) 使報紙減少知識性色彩，使其更大衆化。然而，這種作法卻減弱了報紙與城市識字程度高及專業化群眾間的連繫，但報紙與鄉村地區的連繫卻未見加強。

伍、中共所謂「國家統一」的難題及其未來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大眾媒介扮演了結構統一的重要角色，廣播網、報紙、印刷和電影等，是中共執行政策的重要工具。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大陸還沒有這種政治傳播的滲透網，國民政府曾盡力建立一個大眾媒介系統來擴張其權限，但國民黨就從沒像現在的中共一樣，完全控制整個中國大陸。在國民政府統轄的地區，媒介在極少數的城市中心孤立著，情況和現在一些開發中國家一樣。一九四九年以前，有線電廣播電台並沒延伸到鄉村；一九四九年以前，也沒有任何煽動系統，把媒介與親自傳播聯在一起。事實上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鄉村就被共產黨滲透了，他們建立了親身傳播網來挖國民黨的牆腳。雖然今天大陸的某些地方，土語仍有影響力，非正式口頭傳播仍然存在，但中央與地方的交互反應已有了質的改變。很顯然地，在雙邊的傳播交流中，中央告訴地方的比地方反應給中央的多得多。

中共建立的現代媒介控制著大局。毛澤東和文革前的劉少奇都是透過收音機、壁報和讀報團而使個人的映象散播四處；黨也以國家最高機構的身份，散佈在大陸的每一個角落。

其他統一的象徵，也透過一些傳播媒介散佈在民間。最重要的是，媒介還為其敵人樹立象徵，所謂「美帝國主義」即其一例。中共的大眾媒介，利用不斷的反美口號及「解放台灣」的叫囂，提醒人民外力的存在。他們的媒介也集中人民的注意力，追求工業的現代化。媒介又以所謂「國家的進步與統一」

爲內容，描述地方的發展。在美國發展電視使全國人民共享同一個節目之時，中共也大量的發展一些新術語、新項目、新故事，以及大陸人民如今所共有的人格，藉以提高整個大陸的醒覺性。

此醒覺性的提高、動員了全部人民，他們不管在心理或生理上，乃時時準備要統一成爲一個新的結構。它還有個附帶效果，就是政治的合法性，這裡指的是中共把「社會主義乃統一中國之正途」這個觀念灌輸給大陸人民。在新聞媒介上直接鼓吹社會主義，也可以達成政治的合法性。

然而，要達成所謂「國家統一」，大眾媒介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光靠它也是不夠的。媒介對中共而言，是領導人物的工具，因此媒介衝擊的本質大大受中共領導圈內一切活動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使黨觸了礁，在這段過程中媒介幾乎起不了統一的作用。媒介反應了黨裡黨外的混亂和分裂鬥爭，給黨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壞印象，使黨的合理性大受毀傷。

但是一旦國家的認同和意識建立起來時，它們就跟任何一個政治團體的興衰浮沉無關了。一個政治團體僅能大大地把國家的認同建立起來，但卻不能隨意操縱它。國家的認同一旦建立之後，就有它自己的衝力和慣性。雖然國民政府因中共的盤據而撤離大陸，但國民政府確實有功於全國認同的強化。John Fairbank 說得好：「以某種方式而言，國民黨統治時期可以說爲今日的毛共集團鋪了一些路。譬如政黨的政府、黨軍的建立、青年動員以及經濟動員，都是共產黨模仿國民黨的。」國家認同的力量和全國動員的經驗，使得德國和日本不僅能免於法西斯政治機器的摧毀，並且又能在戰後迅速復原。文革對中共的打擊不至於比德、日受二次大戰的摧殘更嚴重，是故中共長期鼓吹的所謂「國家主義」似乎也不

致因文革而消失於無形。

一、中共欲求所謂「國家統一」的一些難題

乍看起來，一九七〇年的中國大陸似比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更顯得統一，但若就其現代化的遠景而進一步看，其統一仍然充滿了種種問題。

統一的語言仍有待建立，今日中國大陸仍有很多地區使用方言。中共一家報紙描寫紅衛兵從四方聚集到北京車站的情景，有這麼一段記事說：「年輕人說著不同的方言，但是他們的紅臂章和手中的紅冊子『毛語錄』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紅衛兵大體上是高中生或大學生，照理應該在學校就學會國語的，來自同一地方的紅衛兵用方言交談還說得過去，但是這則記事居然說，來自不同地區的紅衛兵，交談上有困難！喜愛方言而不喜愛國語，無疑地會加深地域觀念。文革期間，很可能是由於這些地域觀念的作祟以及交談上的困難，而使各地的鬥爭為之擴大的。

大陸統一的另一難題是，在共產媒介體系中，除了一些口頭上的以外，農民絕少有參與的機會。而農民絕少參與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共不願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農民沒參與政策造成的激盪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可以看出，在「大躍進」期間，黨和農民之間缺乏認同，一直是黨、毛匪、尤其是左翼份子遭遇挫折的主因。農民的淡漠，一直誘使左翼份子使用人民口號，希望人民參與他們的計劃，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

由於黨不願改善鄉間環境，由於毛匪愛好「群眾操縱」，由於他左派徒孫的人民口號，農民和都市工人之間的對抗愈變愈劇烈了。文革之前，黨就必須發起「聯合農工」的運動，來處理農工互鬥的情形。文革期間，有些地方的農人就公然與工人及學生衝突。

大陸統一的又一個重要難題，就是中共的首腦們（尤其是毛澤東本人）惡毒地反對知識份子，林彪說過：「我們的國家是在七億個無產階級者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需要一個統一的、革命的、正確的思想，那就是毛澤東思想。」但是整體的認同，不是單靠一則政治信條就足以為功的。Edward Shils說過：「就國家尺度上的社會成就以及主權上的展望而言，都需要國家認同的意識，這種意識至少有一部份是集中於社會的文化活動。」知識份子就扮演了這種功能。然而他們在文革期間卻受到絕大的創傷，就是在文革之前他們也遭到毛澤東不斷的攻擊。

以上三個難題所以提出來討論，是因為它們在中共傳播體系之研究中比較突出，若要對這方面的問題作全盤的研究，就必須包含本文之外的另一些因素了。

二、前途

以現代的論點而言，中共制度的建立過程是斷斷續續，有時又不穩定的。在此種情況下，政治首腦如毛、林之流，有極大的自由去擴展開發的途徑，黨宣傳工具早期的工作大大地擴張及加速了所謂「國家主義」的成長。而危險的是，這些政治首腦居然把「國家主義」強化成了「國家意志」，尤以文革期

間爲然。Deutsch說：「事實上，這表示社會傳播的通道已閉塞，個人的心靈也閉塞了。」大事向毛澤東學習，大量印行毛語錄，就閉塞了個人甚至於整個「國家」的心靈。強化「國家主義」爲「國家意志」，可拿對死人的崇拜爲代表。「意志力量的最後象徵，就是死人從墓中回來，完成未竟之業。」從一九六三年以來，左派份子已經起出一大串過世的英雄，要老百姓效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有一則新聞報導說：「中共已經發起運動，鼓勵青年不怕死，不怕難，並且公佈了一群新英雄的名單，其中包括一個死於森林之火的十歲小孩。北京顯然希望青年們志願爲人民死，如此青年們就能安於被流放到邊遠地區，過一種刻薄而危險的生活。」

現在知識份子被削夠了，黨以鄙俗的理論統治一切，軍人控制中下層，很可能國家主義就這樣發展下去，「國家主義」又強化成「國家意志」的情況可能延伸到邊疆。我們且引一段兩個紅衛兵和一個日本青年有趣的對白來看看——

日本青年問：「你想過出國嗎？你希望去那裡？」

天津中學的紅衛兵說：「我沒想過，我們不會想遊覽，但若有機會，我想去越南幫越南人民掃除美帝！」

日本青年又探問他們生活的目標。

北京航空機校的學生說：「我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毛澤東教導我們說，『世界是你我所共有，但最後還是你們的。你們年青人有精力，又值盛年，如花盛開，如日東昇：我們的希望就寄託在你們身

上啦：』世界上仍有三分之二的人仍未解放，這是我們最操心的事。」

我們切莫以爲這兩個學生的回答是社交之詞而等閒視之。如前所述，中共的宣傳工具建立此種惡毒的「國家主義」已二十餘年了。文革期間紅衛兵加諸駐北平外國外交官員的暴力，就是宣傳並教育所謂「國家主義」的產物。爲了鞏固其力量，左翼份子可能會把對「國家」的注意力引向大陸以外，所謂「國家意志」的力量就在那兒發展。

這種發展，並非無可避免的。前面已經說過，中共首腦們在促進所謂「國家」開發的途徑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問題就在他們這種強化「國家主義」的策略，究竟是暫時性抑或是長久性的？

